

致 谢

我们在此谨向众多为本书的撰写作出贡献的人们致谢。本该感谢的人们很多，部分是因为这项几乎 10 年前起始的课题得益于众多的调查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并经历了中国及世界银行内数次的行政重组。

对此书作出主要贡献的是为此书撰写论文的作者，他们在漫长的审阅与修改论文的过程中表现了非凡的耐心。他们的名字和所属的机构载于撰稿者名单里。

许多其他学者和机构对本书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初期，这是世界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之间的一个共同的课题；在课题进行的过程中，许多其他合作机构也参与进来。我们在此谨特别致谢：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所所长李青松以及张平、张学军；
- 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与数量经济研究所，包括所长李京文以及我们的同事郑玉歆和他的助手们；
-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包括彭肇平；
-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包括杜鹰、邱纪成和罗小朋；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包括陈剑波和李国度；
- 国家统计局，包括卢春恒、李启明、邢俊玲、张守清和前工

作人员刘力；

- 冶金部，包括张信传和薛德钊。

我们在此谨感谢：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贾维德·伯奇先生，他最早并持续地支持本课题，使课题最初在他领导的中国局得以启动；中国前首席经济学家萨希德·尤素福；中国局工业与能源处前处长里查德·斯特恩。Chen Kang, Xiao Geng, Zheng Decheng 和迪里帕·拉瑟对研究提供了有力而有益的支持。我们还感谢塞西拉·吉多—斯帕诺和维斯纳·潘特洛维奇的慷慨的和有效率的行政支持。

我们在此还感谢那些在本书出版阶段给予帮助的人们。他们包括世界银行的南茜·列文和电信发展公司的梅塔·德考克罗蒙、芭芭拉·卡尼、达夫尼·莱维塔斯、格莱恩·麦克格拉思和唐娜·麦克格里维。许多在这里没有列名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评论者贡献了弥足珍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使本书内容比最初构想时要好得多。

此书总的质量还得益于那些准备工作性论文或者对初期文稿进行审阅和指教的人们。他们包括 V·K·契蒂、理查德·H·戴、兹维·格里立格斯、汤马斯·劳斯基、Wang zhigang 卡拉·魏玛和 Zou Gang。

我们也十分欣赏现在仍在或曾在布朗代斯大学就学的 Xu Wenyi, Wang Benzhou, John Zhao, Albert Hu, Bai Huamo，布朗代斯大学经济系的克莱尔·辛考塔和玛丽·史密斯在许多方面为课题提供了后勤支持；他们为许多中国合作者访问美国和布朗代斯提供了特别的协助。

我们还要感谢艾伦·盖尔布，世界银行转轨经济处前处长，他不仅提供了宝贵的指导，而且亲自参与研究，并在较新的转轨

经济学领域研究中提供经常性的耐心的支持和鼓励。该处使课题组研究人员得以与来访的同事和学者进行一系列内容丰富的知识交流。该处研究人员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有关其他国家经验的比较性的参考框架，并不断地向我们显示中国经验是多么的不同以及为什么必须考虑这些中国经验。

除了世界银行资助之外，我们谨向亨利·罗斯基金会、美国学术性学会委员会、蒋经国基金会和布朗代斯大学马兹尔基金表示感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谨此感谢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的研究工作看来似乎永无止境时，他们给予了我们鼓励、耐心和支持。

撰 稿 人

本文中提及的撰稿人¹所属机构为该撰稿人在写作论文时所归属的机构。

陈剑波	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阿尔伯特·G·Z·Hu	布朗代斯大学经济系
加利·H·杰弗逊	布朗代斯大学经济系
梅路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弗兰西斯·C·帕金斯	澳大利亚堪培拉外交与贸易部东亚分析处
马克·M·皮特	布朗大学经济系
路易士·普特曼	布朗大学经济系
汤玛斯·劳斯基	匹兹堡大学经济系
英德杰特·辛格	世界银行过渡经济处
王本洲	香港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邢俊玲	中国国家统计局
张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守清	中国国家统计局
约翰·Z·Q·赵	布朗代斯大学经济系
郑玉歆	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与数量经济研究所

1. 本书所有人名均根据英文音译。——译者。

绪 论

加利·H·杰弗逊
英德杰特·辛格

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增长改善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准，并给更多的人口提供了间接的好处，这是二十世纪后期最富有意义的进展之一。此书的写作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第一个前提是，中国剧烈的经济改革的关键在于它的工业化。第二个前提则是，中国真正的工业化寓于中国企业和工厂之中。

此书旨在记述中国工业经济改革的影响，并试图阐释为什么与东欧、甚至俄罗斯的更为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比较起来显得较为逊色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如此广泛的效果。此书与许多研究与分析中国经济的著作在诸多方面有下列不同之处：

与传统的国有与非国有比较方法迥异，它对不同的所有制进行了首次深入地比较，以显示中国所有制体系中真正的组织上的、行为上的以及经营上的歧异之处。

它分析了各项具体改革措施使中国不同所

有制企业的行为和经营方式发生改变的程度。

它审视了中国成百万的企业是如何与体制的以及国际的环境相互作用，以形成一个有生命力的改革进程，这一改革进程极大地扩展了来自中心的改革动力的影响力。

它试图区分、评价并调和不同视角与学派有关中国改革的性质的看法。

对有组织地从事生产的最基本单位——工业企业的分析为人们提供了最深入的、最为全面的视角，以了解中国在经济转型期间所取得的进步以及所面临的问题。通过它与其他经济部门关系的描述，人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窗口，以审视并理解中国劳动市场、金融体制、社会保险、外贸与投资体系以及司法与立法体系的改革。因为工业企业与如此多的其他经济单位有联系，工业企业的改革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改革。

此书是 80 年代末着手进行的世界银行研究项目的延续结果。该项目授权进行两项国有企业的调查。一项调查包括 1200 家“城市体系”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另一项调查包括 300 家乡镇企业。两项调查涵盖日期从 80 年代早期至 1991—1992 年，深入研究了被调查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信息。第三套数据来源于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涵盖了 1988—1992 年的大约 5000 家大中型企业，差不多是这一时期大中型企业总数的 1/3。1993 年的数据资料涵盖了全部 18500 家大中型企业，分别属于 14 种不同的所有制体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集使我们得以将我们的分析深入到重要的外资部门，外资部门包括外资和侨资企业，有时候它们被一起统称之为外资企业。另有两项调查，旨在调查中国工业企业技术革新和外贸的活力。这五套数据中的一份或数份构成此书大部分章节的实证依据。它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统计数据来源，使更多的学者受益。

这些基于 7000 多家企业经验的调查数据为研究者提供了记录，以使他们可以跟踪中国的新老企业是如何对体制与政策环境的变化作出反映的。这些企业的统计记录了每一个企业的经历，并使我们可以勾勒出关于中国总的改革经历的计划、过程与结果的广阔的画面。虽然本书大部分章节所依据的数据将很快“过时”，然而本书的数据与分析将对一个时期提供一个重要的记录，而这一时期将极可能决定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十年中的走向。

除绪论之外，此书收集了 11 项协调性的研究。这些研究记述并分析中国工业企业在管理与经营中的变化。第 1 章讨论中国工业经济结构的全貌。第 2 章从调查的主要数据出发，叙述并比较主要所有制类型之间的管理体制。第 3 章至第 5 章应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第 3 章描述中国经济与体制结构的主要特点，这种经济与体制结构创造了一种有活力的内源性的改革进程，许多作者将它称之为“工业革新阶梯”。工业革新阶梯有两个相互作用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技术革新，第 4 章将其模型化，并从经验出发进行了探讨。第二个层面是体制上的变化，或者说企业改革，第 5 章认为企业改革是由工业体系本身和中央改革者两方面条件所决定的。第 6 和第 7 章审视了中国工业的经营状况，第 6 章回顾了有关中国企业改革的总的文献，而第 7 章则比较了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的经营状况。第 7 章通过将政策和企业具体情况定为常数，试图发现“纯所有制”对生产率的影响。

和第 7 章一样，第 8 章至第 11 章讨论形态模型和技术计量经济工作。其中每一章试图就某一个特定的企业功能探讨一种或数种样本企业的行为。第 8 章用比较的方法集中讨论国有企业、城市合作社、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资制定与用工行为。第 9 章将注意力集中在乡镇企业和一些农村私营企业身上，探讨在这一重要的、但却很少为人所了解的部门的企业是冗员、雇工不

足，抑或选择或多或少的利润最大化的用工政策。第 10 章审视投资过程，提出了一个关键的、也许对于所有转轨经济都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否最成功的企业正在赢得稀缺的投资资源以扩大它们的生产份额？第 11 章探讨了各种开放政策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业绩的影响。

对于对中国经济改革“思路”感兴趣的读者，此书中的三篇“概念高深”的论文也许是值得一读的。附件 1 从主张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领导人或改革家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改革，提出了一个最佳改革策略与企业投资决策之间的比拟模式。第 3 章将中国的工业经济视为一个体系。它将弗农（1966）、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的产品周期和质量阶梯延伸到中国国内的工业经济，以描述一个有活力的体制改革和技术革新的过程。第 5 章有一节题为：“含意：共同点、科埃斯定理和产权市场”，将公共物品和社会的外在性拓展到国有企业领域，力主将科埃斯定理的逻辑运用于中国工业的改革。这一规范性的材料证实了另外两篇文章所提出的应将建立知识产权市场作为中央优先选择的政策的观点。

中国改革要点

记述并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特点的书可谓汗牛充栋。¹此书不可能替代这些书籍关于中国改革的真知灼见。下面要进行的简短讨论仅仅旨在使对中国改革不太熟稔的读者了解其要点，使较为熟稔的读者了解构成中国改革进程的最本质成份的动力。

中国的工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发轫于两个卓有成效的改革动力——对外开放政策和农村改革，对外开放政策和农村改革的轮

廓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已经清晰可辨了。中国早期的改革家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些互补性的政策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外开放政策使外贸、投资、新技术、管理知识和外汇涌入了沿海省份。农村改革带来了迅速的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使个人和地方政府的创业精神得到释放，反过来极大地增加了国内储蓄并释放出过剩劳动力。对外开放政策和农村改革造就了新的工业企业结构，并产生了众多的生产集团之间激烈的竞争以及技术与体制改革的压力。这些条件迫使中国中央集权的贸易体制、要素配置和工业企业体制不断适应现代市场导向的经济的要求。

对外开放政策和农村改革为新资本、劳动力、管理知识和公司的形成与市场准入创造了适宜的环境，由此在中国大部分产业部门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另外两项改革——即管理权力下放和价格的双轨制——形成了必要的激励机制结构。由于企业可以提留利润和支付奖金，工人和管理人员便有了一整套强大的——也许是不平衡的——激励机制扩大并积敛财务盈余。价格的双轨制使有关原价与卖价之差的决策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控，这便发挥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使较小的新企业获得必要的市场准入，从历史悠久的老企业得到生产资料以进入市场并得以发展。同时，它使业已在国营部门生产的企业获得产品与市场空间以扩大和重组它们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

创造这些宏观与微观动力的至关重要的前提便是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中国当局通过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手段确实维系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1989 年的通货膨胀造成的极高的政治与经济代价的教训，有可能促使中国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中国工业状况

中国工业经济在 1995 年创造了 3400 亿美元的增加值，这大约等于美国当年创造的增加值的 1/5（世界银行 1997）。而按其他方面的数据，中国工业经济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90 年代中期，700 多万企业雇用了 1 亿 4 千多万工人，而在 1978 年仅仅只有 5 千万工人，这几乎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8 个成员国总职工数相等。

中国经济每年增长的工业生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多。1980—1995 年 15 年间工业年均增长率为 14%，这主要由以下三个因素促成：增加 9 千万工人，其中 2/3 来自农业；每隔四、五年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增长一倍，这主要是由国内储蓄率促成的（国内储蓄率由 1965 年的 25% 上升到 1980 年的 35%，现在则高于 40%）；每年总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 3% 至 4%（见本书第 6 章；世界银行 1997）。

虽然按世界的标准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1980—1995 年间，几乎平均增长 8%——是快的，还有两个正在崛起的部门成为中国工业增长与改造的主要动力。第一个动力是乡镇企业，在 15 年间年实际增长率几乎达 22%，1995 年乡镇企业工业产量占工业总产量 1/4 强（见表 1.3）。乡镇企业在 80 年代是工业增长的动力，而到 90 年代，增长主要来自“其他”部门，即个体、股份制、国内联营和外资（中外合资与外国独资）企业。

在这“其他”部门中，所有制形式的种类与传统的非公即私的思路完全相悖。虽然在这一部门中大部分原始资本是公有的，（最明显的是，国有和集体企业被改造成为合资或股份制公司），

这种改造之所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注入了国内的或外国的私人资本。在这一部门中 90% 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型私营企业，通常被称之为“个体”或“私营”企业。

在 90 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结构大致上 1/3 为国营，1/3 为集体或乡镇所有，1/3 为公私合营或私营。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方兴未艾的发展，而不是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的源泉。

中国工业：需要阐释什么？

中国工业经济的超乎寻常的业绩是举世公认的。然而，在有关其增长的原因与持续性问题，意见不一。许多观察家被三个悖论所迷惑：

与其他过渡性经济相比，从大部分经济学家关于构成一整套有效市场机制的一般观点看来，中国的工业改革是局部性的，零敲碎打的。结果，关键的市场机构，包括破产法、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险体系仍然未能建立。但中国的工业增长却相当强劲，并且看上去还会继续下去。

中国的经济由国有企业——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占统治地位。虽然这些企业兼有经济学家所指责的公有制惯常具有的消极性，它们在重要的过渡早期却创造了中国工业非同寻常的增长。

大部分有关中国工业，主要是国有工业的生产率的文献都报道说生产率增长了。然而，国有工业的获利能力却在下滑，而且亏蚀的企业数在上升。

解决这些悖论的一种方法便是断然否认它们。例如，萨克斯

和吴（1997）认为国有工业的上升的生产率是虚假的，中国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存在内部机制上的缺陷，注定很快就要失败的。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快速的、全面的和即时的改革，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持续。

解决这些悖论的另一种方法则是建议进行渐进改革的人们提出的。例如，诺兰（1995）认为，增量的改革为有效的过渡创造条件，而一场剧烈的断然的“大震动”却会毁掉过渡时期增长所需的机制。他表示，“既然一整套广泛的产权管理机制现在可以被认为与有效的经济运作相适应，那么，中国国有和集体企业经营改善应该是不足为奇的。”（1995，第 317 页）其他人，包括麦金农（1994）以及墨菲、施莱弗尔和维西尼（1992）提出了“次优”改革模式，在这些模式中，由于自由化仍然处于不完善的状态之中，放松某些政府的控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我们认为这些悖论确实存在：尽管经济机构的改革不充分，公有制中存在内在的弱点，国有企业广泛地亏损，但中国经济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旨在弄清并解决这些悖论。

主要的发现是什么？

此书的结论是围绕如下几个基本问题而作出的：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继续并拓展改革进程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中央有限的改革措施有如此大的效果？我们如何解决有限改革与飞速发展的悖论呢？

在管理和机构环境中，是什么改革造成了企业经营的变化？在造成不同企业类型之间经营的差异中，所有制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能找出造成经营业绩极佳的公有制企业悖论的原因

吗？

- 中国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改善了吗？如何解决存在于中国工业，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中的擢升的生产率与下滑的获利能力之间的悖论呢？
- 中国企业在用工、工资制定、投资、革新和出口趋向中的行为有什么变化？企业在顺应激励机制和相对的价格变化中是否提高了效率？

此书的主要发现可归纳如下：

增长与改革

改革战略。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对风险的厌恶使中国最初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战略。有利的初始条件与偶然的早期改革政策使中国的过渡得以顺利进行，而中国过渡的成功使渐进的改革得以持续下去。

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对于中国的成功经验作出诸多的阐释是不足为奇的。萨克斯和吴（1997）强调初始条件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占主导地位；相对而言，在农业中没有国家财政补贴和社会性服务，这使中国不发达的经济比被无处不在的国家财政补贴和毫无用处的固定资产拖累得疲惫不堪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更能适应粗浅的、互不连贯的改革计划。杰弗逊和劳斯基（见第3章和附件1）也强调中国在改革前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就是初始条件）的重要性，这些条件促使在企业管理层和地方政府中出现激烈的竞争和强有力的激励机制。这些条件一旦融入体制之中则会反过来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原性的改革进程。格罗夫斯、洪、麦克米伦和诺顿（1994）认为，有效的激励机制，特别是管理层的激励机制的出现使中国得以“从计划体制中渐渐发展出来”。

虽然不同的阐释可能有不同的政策含意，但关于中国快速的工业革新的原因的解釋互相之间也还是关联的。我们将这些关于初始条件、竞争和激励机制的解釋综合了起来。所有这些条件使有限的改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时也造成了进行新一轮改革的压力。诺顿（1994）认为，“在（计划经济）瓦解中有一个总的一成不变的逻辑性存在”（第 306 页）。在本书中这一观点陈述为，在一个竞争性的经济框架中，中国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始终一贯的逻辑。

本来一个更为急进的改革进程也完全是可能的，但那将付出更多的代价和经历更多的风险。戴、王和邹（1994）基于一个富有活力的善于适应环境的企业行为模型提出了好几个政策改革设想。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在一个急速的改革进程中，中国更快地放松对价格的控制，重新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以进行更为快速的重组，那么，在中国的经济中将更易出现通货膨胀和波动，中国将不得不裁减更多的职工。

杰弗逊和劳斯基（参见第 3 章和附件 1）在他们的总的理论框架中将改革进程比喻为企业的投资决策，在投资决策中，改革与投资的进程取决于投入（改革）与产出（社会福利）、不确定性、风险以及调整成本之间的技术关系。在他们看来，改革与固定资本投资一样是不可能不花代价而逆转的。因此，在一个不确定因素所笼罩的世界里，在一个边学边做的环境中，最佳方案当然不会是剧烈的断然的“大震动”，而是比它缓和得多的做法。由此出发，由于对改革结果缺乏一个明确的看法，中国必然必须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相反，在东欧，意想中的目标，即西欧模式，是清晰不过的，采取剧烈的断然的“大震动”式的改革旨在迅速达到目标）。再则，在中国，诸种初始条件却扩大了部分改革手段的细微的好处。最终，在中国，年增长率 9%

10% 被广泛地认为是必需的。这样，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取得高增长率，同时，社会又处于安定之中。预期的目标是，为了维持高增长率，中国将继续进行改革，但不是“大震动”式的改革。

技术变革。在中国，基于市场机制的技术变革是广泛的，竞争和市场激励机制刺激广泛的产品革新。而且，正在出现的研究与发展资源市场（资金与工程师）在国有与乡镇工业企业中产生了很高的、令人惊讶地一致的收益。

杰弗逊和劳斯基（见第 3 章）描述了一个富有活力的进程，在这进程中，通过合资企业和较大的公有企业引进的国际市场上的革新融进了中国整个的经济之中。由于技术较为简单、成本较小的生产者的模仿，新产品和工艺在工业阶梯上降级，同时造成在阶梯上往上爬的竞争压力，这样，促进了处于阶梯顶端的企业新一轮的革新努力。完全可以预料，在工业革新阶梯上，竞争将促进更多的技术革新。同时，可以预料，研究与发展资源将在阶梯上降级，以创造更具竞争力或更优越的收益率。

在第 4 章，杰弗逊、劳斯基和郑显示了中国的乡镇企业至少在 80 年代后期是如何处于在技术上追赶国有企业的紧张的过程中的，当时，人们广泛地认为这些国有企业在众多的产品集团中处于技术领先地位。仅仅就革新的量而言，乡镇企业花在研究与发展以及技术人员身上的钱比国有企业创造了更高的收益。就革新的质量而言，以新产品的获利能力来计算，中国工业经济内的研究与发展支出以及技术人员的配置似乎是十分有效的。

制度创新。事实上的产权已经下放到中国公有企业，对某些企业来说，这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补充的决策权和激励机制。虽然权利向企业和管理层下放的情况不尽相同，许多国有企业比一些乡镇企业享有更为广泛的权利，但在乡镇企业部门一般来说产权

下放得更为普遍和相等。

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国有企业享有了多得多的产权，虽然这些变化往往是通过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契约显现出来的。在产权方面的变化包括：企业享有更多的决策权，在企业内可指定一个代表中央权威的承包代理人，以及向企业、企业的中央代理人或经理重新分配剩余索偿权。如果这些权利是不相等的（比方说，如果既存在实质性的企业自主权，同时企业内部的权力却是多头的，且激励机制十分薄弱），那么，改革就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在所研究的样本企业中，研究者发现在乡镇企业部门决策权和激励机制结构更为分散并一贯，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乡镇企业的经营状况相比而言较为强劲。

明确国有和集体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的产权是学者和中国决策层所一致认为的首要改革目标。对于横店公司——一个乡镇联合大型企业（附件 2）情况的调查显示，一个包含强而有力的激励结构的精心策划的承包体系在有些情况下有效地替代了人们惯常概念中所认为的私有产权。坚持认为公司所有权属于它的横店镇政府与公司领导以及职工的摩擦在很大程度上被个人异乎寻常的力量和成就以及生产与收入的快速增长所化解。这些条件中的一个或数个条件一旦消失，那就很可能会暴露出公司没有明确界定产权的代价。对于没有明确界定产权的担忧促使成千的乡镇企业“将所有权个人化”，也就是说，在管理层、工人和当地居民中分配股票，有时候将相当一部分股票分给地方政府，这样减少了——当然不是消除了——正式所有权的模糊性。

改革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几乎所有关于企业改革的文献都讨论了改革对经营业绩的影响。而因果关系也从相反的方向对经营业绩产生强烈的影响。愈益糟糕的经营状况，特别是基层政府经营的企业的愈益糟糕的经营状况迫使进行新一轮的改革。事实

上，工业革新阶梯预示从企业经营到改革存在因果性。

工业革新阶梯描述了旨在缩减财务支出以及寻求更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新技术与市场的竞争。这个进程是内原性的改革的中心观念。杰弗逊、陆和赵（第 5 章）使用企业数据找到支持内原性改革模式的证据，特别是在生产率低下、财务情况糟糕、面临一个富有竞争性环境和来自低一级政府监督机构的国营企业中是这样。这些状况刺激新一轮企业改革。这些发现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应该认为中国的工业改革是中国工业体制内部力量引发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中央官员支持的改革的一个延续。但是，从事将大企业改为合资企业或股份制企业的管辖机构往往选择那些最为成功的国营企业。这一表明经营状况带动改革的证据同时提出了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审视改革与经营状况关系的走向与程度变得十分困难。

政策含意。一个富有活力的工业革新阶梯的出现出许是中国过渡时期最宝贵的资源。为了使个体经营者、公司和地方政府能很好回应工业体制内部产生的改革的压力与机遇，中国政府应该运用科斯定理的逻辑。就竞争与改革动机而言，明晰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将促使企业家、公司和地方政府较易就旨在提高效率的控制权与工业资产的交换进行谈判。

中国的工业革新阶梯包含一个庞大的异质的企业群，它们竭力在一个实实在在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激励机制中寻求生存与发展；这一工业革新阶梯是中国最重要的过渡机制。它同时也包含某些政策含意，杰弗逊、陆和赵（第 5 章）在讨论运用科斯定理进行改革时作了概述。从这一点出发，由于企业内部监控的权威与激励机制的减弱，分散的公有制每每表现出与公共物品相似的特点（非排他性，按照非排他性，管理人员、职工和公务员从企业获取的比他们给予企业的为多；非可缩小性，按照非可缩小